



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成功规避“发展陷阱”

□ 曾 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个重大论断,是在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总结人类历史教训、借鉴各国发展经验、审读全球演进趋势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指引和战略部署,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践路径。纵观人类近现代史,虽然经济发展的道路不尽相同,但主要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各种矛盾和问题,陷入了各式各样的“发展陷阱”。有的国家难以跨越“发展陷阱”,从而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停滞;有的国家貌似跨越了“发展陷阱”,但却将跨越陷阱的代价与成本转嫁给了国内部分群体或其他国家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创造,走出了一条既跨越“发展陷阱”又兼顾全球发展包容的道路,必将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探索新模式,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新道路。

规避低水平国际分工带来的价值链低端锁定

从历史上看,某些后发国家依赖资源优势实现了经济起飞,但却落入了“资源诅咒”,最终未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陷入了“贫困化增长”陷阱;而某些国家利用劳动力等资源廉价的后发优势迅速融入全球分工和推进国内工业化,但是却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加上其他制度性因素,人均经济总量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水平,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两类国家都过于依赖比较优势发展经济,而未在合适的时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所谓的“李嘉图陷阱”。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全面参与全球贸易分工体系,利用庞大的人口规模优势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效释放“人口红利”,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即将推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产业全球竞争力明显提升,逐步从基于比较优势的跟随式全球分工模式转向基于综合竞争优势的主动式全球分工模式,不论贸易行业结构还是技术结构都明显优化,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速度明显加快。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商品出口贸易总额比重从2008年的29.1%提高到2021年的45%。此外,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提升至2021年的12359美元。与此同时,我国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特色化发展,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惠及更多人,到数字中国建设让偏远地区搭上信息快车,从推动医改走深走实,到形成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和一体化发展新局面……通过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规避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收入差距加大

经济增长难以自动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而政策性福利赶超又可能拖累经济发展,因此解决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问题是各国共同面临的发展挑战。在历史上,一些拉美国家在高速发展阶段没有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又在经济增速下滑阶段超常规实施“福利赶超”,没有平衡好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陷入了“拉美陷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引导下,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完善,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较好地避免了收入分配差距加扩大的趋势。

近年来,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避免超越发展阶段福利政策的同时,我国政府成功地实施了精准扶贫,加快推动财税等关键领域改革,常态化

推进反垄断,有效地防止了资本无序扩张,在一定程度遏制了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2012年到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510元增至35128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10亿人。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坚定前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国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在初次分配中,继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再分配中,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同时发挥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第三次分配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通过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规避财富增长带来的道德败落和精神虚无

经济发展是道德进步的基础,但是经济发展不必然带来精神上的追求,如果引导不好可能就会出现精神的虚无和道德的败落。从历史上看,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物质生活得到充分满足后,由于缺乏正确的社会引导,出现了明显的精神空虚和精神虚无,比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就陷入了“垮掉的一代”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我国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强化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创造了精神文明发展的丰硕成果,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精神文化产品生产供给能力大幅提升、精神文化财富大大增加。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坚定“四个自信”,牢固树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向纵深发展,在经济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精神文明的大幅进步。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未来一段时期,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我国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提升公民文明素养,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推动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提升公民文明素养,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推动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规避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现代经济学经典理论认为,环境恶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而不是主观认识水平问题,也不是制度、战略和政策失误造成的。从历史经验看,如果没有国家的政策约束和引导,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并不会立刻带来资源环境的改善。某些西方国家在经济高度发展后环境恶化程度并未明显改善;而有的国家迷信“先发展,后保护”的教条,在步入高收入阶段后才逐步强调环境保护,但是在环境治理中付出了巨大成本,陷入了所谓“环境库兹涅茨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废”治理,到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强调环境容量约束与总量控制,再到注重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国人均排放或历史累积的人均排放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走出了一条“边发展、边保护、边治理”的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发展之路。

但是,由于一段时间里更加强调经济高速增长,加上部分地区环保意识不强,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上存在欠账。新时代以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及美丽中国建设,实施一批包括环境治理保护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在内的国家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生态文明及环境保护取得重大进展,生态文明及环境保护取得重大进展,生态文明及环境保护取得重大进展。2021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历史性达到了世卫组织第一阶段过渡值,成为世界上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2013年至2021年,我国I—III类优良水体断面比例提升了23.3个百分点,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黑臭水体基本得到了消除;我国森林面积增长了7.1%,达到2.27亿公顷,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

我国着力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持续打赢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和净土保卫战,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改善环境质量和扩充环境容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为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解决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通过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规避超级大国发展带来的对外扩张与掠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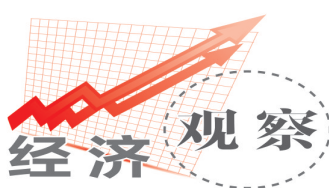
殖民既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和基础,也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动力和需求。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还要求向海外输出剩余资本,因此传统工业化国家的崛起过程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殖民史,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得以确立、发展和壮大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大多数西方国家崛起都未逃脱“殖民化陷阱”的宿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搞“联盟大家庭”,不推行“集团政治”,不划分“势力范围”,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既符合我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准则,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全面开展国际贸易分工,尽力开展对外援助,促进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繁荣,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繁荣和后发国家崛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主动回应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既在与世界的紧密互动中发展自己,也以自身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2013年至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我国大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础上支持经济全球化,持续主动扩大进口,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已经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对外签署的自贸协定数量增长到19个,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对外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促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惠及各国人民。

未来一段时间,是我国对外交往和对外开放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打造我国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实现互利共赢。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实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为当前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指明了前进方向。

实体兴,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实体经济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实体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体,也是国家真正创造财富的经济形态。只有拥有坚实发达的实体经济,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经济中站稳脚跟。发展实体经济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经济实体水平越高,经济实力就越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越强,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硬道理。我国是靠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的,还要依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面对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课题,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之上。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问题仍然突出。伴随着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我国实体经济结构性矛盾,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显现。创新不足带来关键技术缺失,导致结构供给失衡。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经济过度金融化阻碍资本流入导致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制造业竞争的全球挑战加大,面临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挑战。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不深,阻碍了经济整体效能的释放。数字技术在不同产业、行业和地区的覆盖不均衡,数字技术尚未形成对产品全生命周期和产业链的深度赋能,以及信息基础设施不完备、监管体系与标准规范不完善等,客观上制约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我们要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变化的潮流中、在各种风浪挑战的冲击下行稳致远,就必须牢牢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

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关键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推动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提升和高质量发展,必须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这就要推动报酬结构再平衡,形成实体经济友好型报酬结构,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人才、企业家才能、长期资本等优质生产要素更多向实体经济领域配置。虚拟经济必须与实体经济相协调。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体系提供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能力,加快建设支持创新创业的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形成机制,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处理好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并举。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转

如何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 蒲 实

型升级是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任务之一;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这要求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改造,推动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释放新潜能。积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打造新兴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策源地建设、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处理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推进经济循环真正畅通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就要求在原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两者之间的协调配合。一方面,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为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供给体系也要进行及时调整,这样才能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打通经济循环堵点,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不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扩大内需有效制度。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扩大内需的政策要适当加大力度,从供需两端推动经济扩容提质,逐步迈向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